

海外学者论丛

李君如 张勇伟 编

# 海外学者论 “中国道路”与毛泽东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海外学者论丛

李君如 张勇伟 编

# 海外学者论 “中国道路”与毛泽东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沪)新登字302号

责任编辑 张广勇

封面设计 闵敏

**海外学者论“中国道路”与毛泽东**

李君如 张勇伟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浙江诸暨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5 字数260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80515-888-6/D·116

定价: 8.50元

## 序

西方人常说：“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其实，中国人是否都深刻了解自己的祖国呢？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不仅是最多，而且是比任何国家多得多的口，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凝聚在一起？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绵延着 5000 年悠久而独特的文明的国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为什么经历了多少历史风暴的洗礼，这个文明仍能闪烁着自己的光辉？她又具有怎样深刻而巨大的潜力？中国直到 17 世纪前仍是世界上经济和科学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为什么在近代沦入落后的境地？又怎样才能使这个伟大的民族复兴，重振历史的雄风？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经过了 28 年的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虽然斗争是艰苦卓绝的，但毕竟只有 28 年，是历史的一瞬间，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掌握了什么魔法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功？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在经历了一百多年被西方列强压迫和剥削的屈辱之后终于站起来了，并在如此复杂的国情下建设成一个令世界瞩目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不仅是震撼中国历史的大事，而且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意识到还没意识到，她也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世界的格局与进程。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走出了中国，走向世界。

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是与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他领导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他去世了，他的思想仍然引导着中

国共产党人前进。

真理在实践中显现。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伟大而激动人心的实践，必然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真理。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而且也必然是人类一份最宝贵的思想财富。因此，不仅在中国，全世界有识之士都在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实践与思想，探求回答上述那些“神秘”的问题，就是必然的事了。

李君如同志多年来坚持研究毛泽东思想，取得了许多有影响的成果，已有专著和论文。从一个研究有素的科学工作者的视野中选译编辑了这本《海外学者论“中国道路”与毛泽东》，无疑是有它独到之处的。不仅具有全面性、代表性，而且也内含着足够的深度。可以说，这个译文辑反映了当代海外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水平。李君如同志的导言：“回顾与透视”已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我就无须赘言了。

当然，外国人毕竟是外国人，掌握的材料有限，加上东西方文化的隔阂，还可能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因此，从中国人观点看来，其中许多内容和结论是十分可笑的。但是，外国人也有外国人独特的视角，如同站在树旁往往可以看到某些在树上被枝枝叶叶缠绕而可能看不清的东西。真理是全面的，它是需要人们从多个视角去认识的。因此，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给我们以触类旁通的启迪，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毛泽东及其思想。

我有幸成为这本译文集的第一个读者。学习之后深感有许多收获。因此，我敢于也乐于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不可多得的书。

刘 吉

1991.12 1

# 目 录

|                                  |                 |
|----------------------------------|-----------------|
| 序·····                           | 刘 吉 ( 1 )       |
| 绪论:回顾与透视·····                    | 李君如 张勇伟 ( 1 )   |
| 中国人眼中的十月革命·····                  | 阿里夫·德里克 ( 56 )  |
| 1927年至1928年的共产党战略:不满的动员<br>····· | 马西妮·里斯泰诺 ( 87 ) |
| 陈独秀和托洛茨基:对两人关系的新透视<br>·····      | 彼得·库夫斯 (116)    |
|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起源: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br>·····   | 约翰·W.加弗 (143)   |
| 国共两党的校园斗争(1937—1945)·····        | 胡阔台 (185)       |
|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式·····            | 尼克·奈特 (214)     |
| 意识形态和中美关系敌对之根源:四十年代的回顾<br>·····  | 迈克尔·N.奎因 (231)  |
| 毛对“中国道路”的探索·····                 | S.R.施拉姆 (252)   |
| 毛何处走错:毛“左”倾政治中的认识论和意识形态<br>····· | B.沃马克 (277)     |
| 后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反思<br>····· | 阿里夫·德里克 (299)   |

## 绪论：回顾与透视

李君如 张勇伟

### (一)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历经风风雨雨，最后领导中国人民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党又率领亿万人民在同样困难的条件下展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再次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党以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表明自她成立以来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为此，她的存在与发展一直成为西方学术理论界所关注的对象。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日趋活跃和发挥其作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状况和发展前途。人们希望了解红色中国。从本世纪的 30 年代起，斯诺及其《西行漫记》在这方面开了先河。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标志着西方人了解和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始端。随着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最有希望的政治力量后，整个西方，尤其是美国开始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的研究。尽管其中大部分人都是为了本国的政治利益和发展在华的势力这些目的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状况的，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尤其是教授、学者，他们开始以较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共产党这一客观存在，以及她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和前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率先形成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群体，正如日本学者村松祐次在《外国对中国的研

究》(1963年)一书中早已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研究中国的中心迅速从西欧转移到了美国。<sup>①</sup>从那时期起,出现了一批像费正清、谢伟思和韦慕庭等这样的著名人物。而《远东季刊》和“远东协会”(后改名为“亚洲研究会”)等专刊和学会的相继创刊、成立,都大大地推进了学术研究。由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等组织对此项研究的投入,从而使研究在经济物质方面得到了保障,并加快了研究进程。

这时期的部分学者目睹着国民党的腐败和中国共产党的朝气蓬勃。一部分人对中国共产党寄予同情。可惜,这些人势单力薄,未能影响美国政府对华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的整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同时也犯有像“大跃进”那样的严重失误。所有这一切都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感到惊讶和迷惑。许多学者在美国的《共产主义问题》杂志上纷纷发表文章,其中较有代表的是:R. C. 诺思的《北平的长征:中共“八大”》(1957年,1—2月),B. 施瓦茨的《毛主义的新倾向》(1957年,7—8月),A. F. 怀特的《中国人的磐石:现在与过去》(1955年,7—8月)等,而这时期较主要的代表著作有:S. B. 托马斯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政府和行政》(1953年),费正清和B. 施瓦茨的《中国共产党文献史》(1954年),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1958年),W. W. 罗斯托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展望》(1954年),A. 艾克斯坦的《共产党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和前景》(1954年),H. C. 欣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1956年),B. 施瓦茨的《共产党中国和毛泽东的崛起》(1958年)等。另外有意义的

---

① 《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1页。

是,这时期还出现了像施瓦茨、怀特、诺思等一批新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这些人在上一代“中国通”的影响下,开始在大学和专门从事东亚研究的机构中,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等各方面作全方位的研究,为下一时期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人。

另外,此时期的美国政府出自于自己的政治利益,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加强了对华的研究。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亲自主持了包括一批“中国通”在内的国策讨论会,研究“新形势下的对华政策”。<sup>①</sup>同时,各基金会也要求所资助的学术团体转向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研究。如果撇开政治目的,从客观上讲,这些都从另一侧面推进了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

当然,真正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方面全方位地开展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取得众多成果,并在学科意义上建立规模的,还是在60、70年代。新中国建立后所取得的进步,中苏论战等,都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浓厚兴趣。这时期是美国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迅猛发展时期。除了大量出版物的涌现之外,另外较引人注目的是,福特基金会提出并付诸实施了两项雄心勃勃的方针:①建立全国性机构来规划、组织、协调并奖励全国的中国研究;②为了推行各大学设立有关现代中国的课程和研究项目,该基金会为此首先推行了一项关于大学研究现代中国的发展规划。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比重明显提高。<sup>②</sup>

综观整个时期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从60年代起,

---

① 参见《外国研究中国》(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② 《美国中国学手册》,前引书,第21页。

不仅一大批有相当学术功底、坚持独立研究的学者群体形成并日益扩大,而且各学术流派林立,各种不同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倾向的人在学术上自由讨论、活跃争辩,颇有点“百家争鸣”的格局。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批著名的学者和有影响的著作。这些主要是:

B.施瓦茨:《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意识形态》(1969年)。

F.舒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1968年)。

鲍大可:《共产党中国的初期:1949—1955年》(1967年),  
《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制度与政治权力》(1967年)。

M.C.奥克森伯格:《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制度化: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成功阶梯》(1968年)。

A.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发展:贫困和意识形态的互相作用》。

J.W.刘易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1963年)。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1964年)。

M.D.戈德曼:《历史在党内斗争中的作用》。

R.克罗泽:《中国文化遗产和共产主义》。

R.D.鲍姆:《革命的序曲:毛、农民和农民问题》(1975年),  
《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8年)。

M.迈斯纳:《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年),  
《毛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和中国社会的前途》。

L.W.派伊:《中国的政治精神》(1968年),  
《毛泽东:领袖人物》(1976年)。

T.W.鲁宾逊:《周恩来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1969年),

- 《中国的文化革命》(1971年)。
- R.特里尔：《八亿人：真正的中国》(1972年)，  
《毛泽东传》。
- M.K.怀特：《中国的小团体和政治仪式》。
- R.H.所罗门：《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1971年)，  
《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1973年)。
- S.B.托马斯：《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与1927  
年的广州公社》。
- J.B.斯塔尔：《意识形态和文化：当代中国政治辩证法导  
言》(1973年)，  
《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1979年)。
- B.沃马克：《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
- J.P.哈里森：《夺权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  
1972)》(1972年)，  
《共产党和中国农民起义：重写中国史研  
究》(1971年)。
- H.C.欣顿：《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196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手册》。
- R.J.利夫顿：《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的心理学：对中国洗  
脑筋的研究》(1967年)，  
《革命永存：毛泽东和中国文化革命》(1970年)。
- R.Jr.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
- H.哈丁：《毛主义关于组织和制定政策的理论》，  
《组织中国：官僚主义问题(1949—1969)》。
- 陈志让：《毛和中国革命》(1965年)，  
《文化大革命内幕》(1975年)。

陈 棣：《五四运动的重新解释》(1970年)。

陈文星：《共产党中国的人民公社》(1968年)，  
《大陆中国群众运动的意义》(1971年)。

纪文顺：《中国共产党文献读本》(1968年)，  
《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冲突》(1972年)。

范光璜：《中国文化革命》(1968年)，  
《毛泽东著作》(1973年)。

熊杰：《意识形态与实践：中国共产主义的演变》(1970年)，  
《毛泽东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1976年)。

邹谠：《毛泽东的革命经验和北京的国际实践》(1966年)，  
《文化革命和中国政治制度》(1968年)。

黄宗智：《毛泽东和中农：1925—1928》(1975年)。

如此之多的著作涌现本身就说明了这时期研究的盛况。另外，使人注意的是，这时期美国学术界的意识形态倾向趋于多元，尤其是越南战争所带来的反政府情绪感染了学术界，并为学术自由带来了新的空气。其在中国学研究领域中的直接结果，就是产生了所谓的“左派”。不过，由于“左派”对中国一度产生的空想倍感兴趣，由此他们的研究也明显带有很大程度的虚空色彩。而且又加上这些人的情绪因素远大于求实的研究，因此这带着另一种意识形态偏执的学派随着中国“文革”的结束与否定而日益衰落。

中美关系的改善大大地促进了美国对华研究的发展。许多学者“积极要求访华，了解中国，并开始客观地介绍新中国的宣传活动”。<sup>①</sup>他们当中一些人通过来华得到第一手资料

<sup>①</sup> 《外国研究中国》(2)，前引书，第107页。

后,纷纷改变了自己以前的看法,开始较公正地看待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和失误,展开了客观的分析和研究。

随着中国十年“文革”的结束、毛泽东的逝世,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西方学者对华研究的兴趣愈来愈浓。开始时,人们只把注意力对准“文革”,在80年代初,西方出现了“文革热”。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人们的注意力迅速转移过来。他们很快就发觉,“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本身就是对“文革”的反动。因此,把“改革”与“文革”结合起来研究很快又热门起来。例如,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两本权威期刊《中国季刊》和《澳中》都分别在1986年——“文革”爆发20周年之际出了专辑,来探讨“文革”和毛泽东对今天中国社会及其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之影响。

这种结合研究的重点自然是放在改革开放上,它体现了西方学术研究的实用传统。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的开放使西方学者得益匪浅,他们可以直接接触众多过去无法接触到的原始资料。这都有助于他们提高自己研究的可靠程度和真实性。当然,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人民和党自身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为海内外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从而使新一代的西方中国学研究学者(所谓的第三代)无论在研究的背景上,还是在材料上都明显比前辈们占居优势。因此,他们的视野比前更宽阔,方法更多样,研究更客观。<sup>①</sup>

## (二)

综观美国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和历史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个相当令人寻味的过程。如果从研究的对

---

<sup>①</sup> 由于作者的浅陋和材料的局限,以及这代学者本身正在变化,因此我们没在此对近年来的研究作述评。

象、视野、方法和立场来看，各学派和各人所体现的风格是多姿多彩的。

可是，如果我们透视这些多姿多彩的立场、方法背后的理性预设(或先验判断)，便可以发现：尽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学派林立，研究丰富多彩，但从认识论意义上来看，各人在其分析、描述过程中所预设的理性判断，大体可划为四类。换言之，即各学者采用了四种分析模式(或理论假设)来组织、规定和处理自己研究的对象，并赋予自己的分析对象以这四种分析模式所体现的特性。这四种模式分别是：①所谓的“极权式共产主义体制”；②现代化中的共产主义体制；③革命的社会主义体制；④中国共产党的全面统治。这四种类型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学者的大体思路。当然，有些作者在不同时期，会采取不同的理性预设，如有的学者在50年代，曾经认为中国是一个共产党极权的国家，但到了60、70年代，他似乎又采取了现代化中的共产主义的分析模式。同样，有些人的分析同时预设了几种分析判断，尤其是第四种类型，常常并不独立地显现，而是与第二、第三种一起并存。因此，当我们分析评判时，只是“理想型”地假设了这四种类型。

以下就这四种类型所流行的年代，采取的具体方法，具有的主要观点，以及各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作一介绍、分析和评判。

第一种：所谓的“极权型体制”。

这一类型代表着一股极右的反华思潮。它主要流行在50、60年代。随着东西方冷战的深入，朝鲜战争加剧中美双方的紧张关系，美国国内的反共情绪日益高涨，这不仅加剧了中西方的隔离状态，而且也使一些原来较为独立的学者，采取了极片

面、并带有很浓的意识形态偏执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共产党及其活动。再加上一部分本来就敌视中国共产党的右翼分子的大肆渲染,从而使这一分析模式主宰了当时整个学术、思想界。

1956年,C.弗里德里克和Z.布热津斯基首先提出了这种分析类型。<sup>①</sup>他们竟然把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特征污蔑地视同于法西斯的特征。在他们眼里:统一的意识形态,个人崇拜和一党制,严格的政治控制体系,党控制的大众传播、党领导的军队和党对经济的干预,所有这些特征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一种“彻底的极权政体”。

许多学者不仅用这种类型去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状况,而且还以此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只是在走苏联的老路,仿效苏联来展开自己的革命和建设活动。W.罗斯托和他的同事曾在1954年写道:“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正在中国的舞台上,努力地重复着斯大林在30年代采用的国内过渡时期的模式,即特别重视创建满足军备现代化的工业基础”。<sup>②</sup>R.麦克法夸尔在其1958年的文章中特别说明了这点,“从所有这些可得出:在中国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中,并无任何地方是由其经济来决定的。对中国领导人来说,由于基本的政治原因,使得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显得异常重要。”<sup>③</sup>

当然,这时期也有人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在50年代是一味地仿效苏联的。费正清曾认为,50年代的中国是以自己的

---

① C.弗里德里克和Z.布热津斯基:《极权专制和独裁》,哈佛大学版,1956年,第9—10页。

② W.罗斯托,《共产主义中国的展望》,麻省理工学院科技出版社,1954年,第299页。

③ R.麦克法夸尔,《通过工业化的极权主义?共产主义中国的情况》,《共产主义问题》(美)1958年9—10月期。

过去与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相结合的产物。但这种结合却又意味着“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东西——极权主义”。<sup>①</sup>鲍大可(A.D. 巴尼特)也认为,中国的特殊情况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尽管她是按苏联的组织原则去管理国家,但她却有着自己深远的中国传统。不过,在“极权主义”这点上,鲍大可如同费正清一样地认为:“中国已建立起第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效的极权体制,这至少在现代意义上是如此。”<sup>②</sup>看来,尽管在是否把中国共产党视作走苏联老路这点上人们各抒己见,但在坚持把中国说成一个极权国家这立场上各人又异曲同工。

一些学者在“极权主义”的分析模式影响下,甚至把中国共产党对旧社会结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的根本改造和重组,视作党为了加强其对全社会的控制而推行一元化统治。R.C. 诺思曾评述,1956年党的“八大”是“这样一幅图画:一个在其目标和信心上反映出来的极权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马基雅维里,对内实行粗暴的统治,为了国家的目的而草菅人命。”但他又承认,“至于中共真正怎样来使用自己日益强大的力量,这是无法预料的”。<sup>③</sup>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当时这些学者对自己所掌握的材料也觉得毫无把握。他们不仅是局外人,而且资料也少得可怜。尤其一些人对我党在建国后展开的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的真实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只根据一些传闻来加以推断,这样就更荒谬了。

当然,50年代后期国内的反右扩大化,在一定程度上使这股反华思潮得以有机可乘,大肆渲染,抨击我党的思想文化改造政策和运动。1953年,《共产主义问题》杂志的一篇文章在

①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哈佛大学版,1958年,第314页。

② 鲍大可,《视野中的共产主义中国》,纽约,1962年,第28页。

③ R.C. 诺思,《北京的长征:中共八大》,《共产主义问题》(美),1957年1—2月期。

描述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时提到,“党试图规定作者写什么,怎么写,以及怎样去支配他们自己自由想象的时间”,<sup>①</sup>从而使“这些人的权威和名誉一扫而尽”。<sup>②</sup>P.L. 沃克则更错误地把中国的第一个五年看成一个“彻底的极权专政”。他认为,“中共是通过控制大众传播媒介来灌输教义,操纵种种群众组织,依靠军队、法院等强制力量来激发对党的忠诚和维持统治”。<sup>③</sup>

在运用这类分析模式中较有影响的代表是施瓦茨。尽管施瓦茨能在运用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娴熟知识基础上来看待这个新制度,但他还是就事论是,把自己的有关理论建筑在仅有的片面甚至虚假的材料上。遗憾的是,他当时得出的结论如同他老师费正清一样仍没跳出这种所谓的“极权主义”的分析模式。施瓦茨在一次评论毛泽东的50年代的某次谈话时说:“那时,体现在毛的谈话中的全部眼光是什么呢?那就是大家都所谓的一种极权主义社会的眼光。在这个社会里,国家在某些具有明确自我界定的文化领域(如自然科学)都始终拥有自己的权威。社会的基本‘和谐’是通过允许某一领域的宽松来更有效地得以保持的,即把一定的利益冲突和一定程度意识形态的错误之存在看成是正常的,以及保存着一些马列主义所无法直接回答的科学和艺术天地。”<sup>④</sup>不过,施瓦茨最终还是提醒人们,“这种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威的基本概念根本上仍

---

① T. T.,《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共产主义问题》(美),1953年2期。

② W. M.,《中国共产党人和资产阶级》,《共产主义问题》(美),1952年1期。这方面内容另可见S. B. 托马斯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政府和行政》(太平洋关系出版社,纽约,1953年)。

③ R. L. 沃克,《共产主义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耶鲁大学版,1955年,第24页。

④ B. 施瓦茨,《毛主义的新趋势》,《共产主义问题》(美),1957年7—8月期。